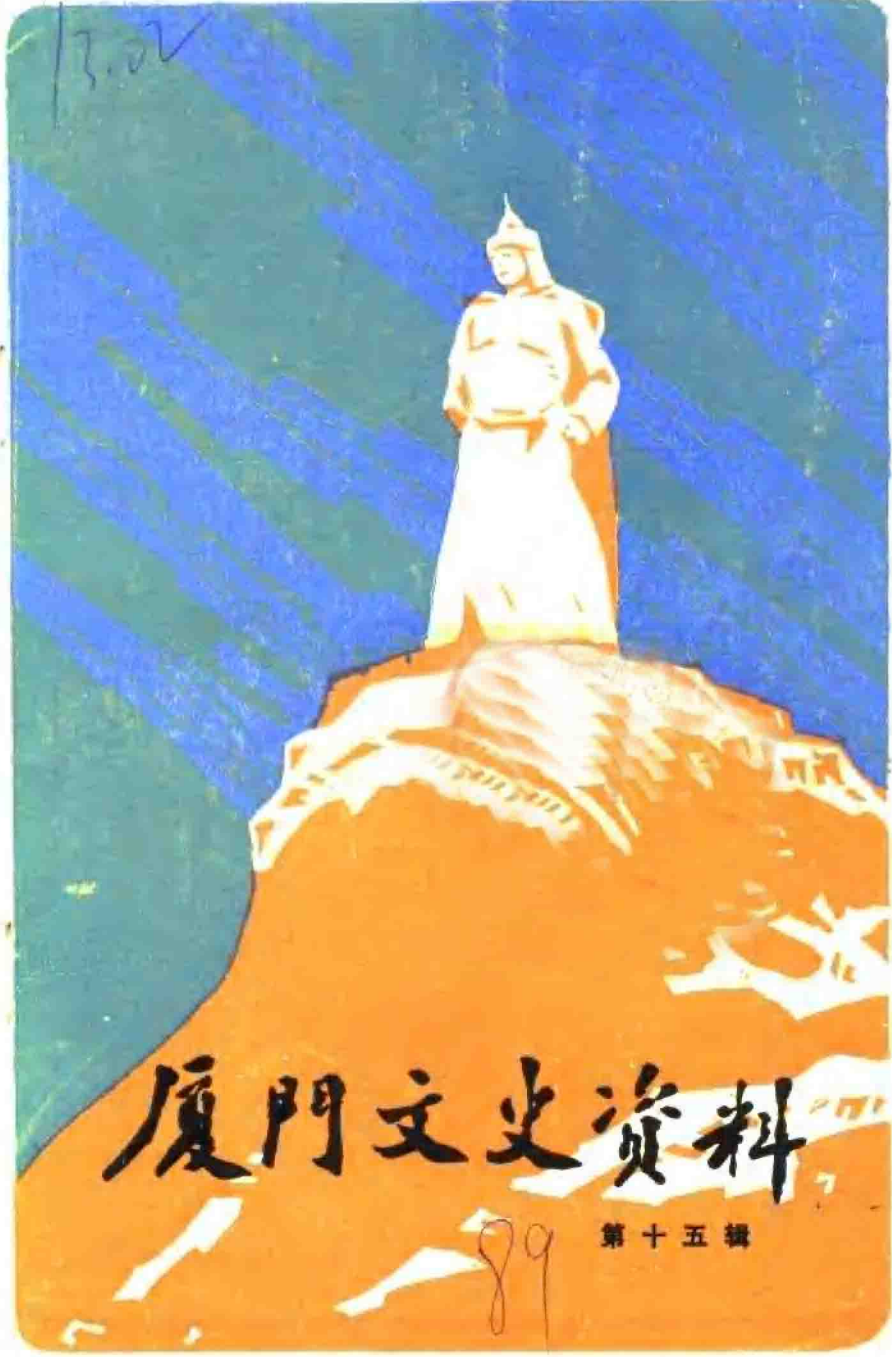


13.02



廈門文史資料

第十五輯

89

148/15

厦门文史资料

(选辑)

第十五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厦门市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

-陈国庆回忆录 刘惠生 陈经华等合译 (1)
- 记爱国侨领庄希泉.....叶赛梅 (8)
- 萨本栋在厦大的言教与身教.....林其泉 (17)
- 对《教育事业家伍远资》一文的补充》.....念 竹 (29)
- 卓全成与同英布店.....卓全成口述 (34)
- 热心兴学的陈六使.....游华章 (55)
- 何葆仁博士传略.....史 姿 (59)
- 缅甸归侨陈德润的一生.....陈尊法 曾冠英 (64)
- 徐赞周与辛亥革命.....丁秋来 (73)
- 杜四端传略.....史 云 (78)
- 胡资周与《星光日报》.....胡冠中 (80)
- 赛月金传略.....罗时芳 (91)
- 著名老中医林孝德.....沈 青 (96)
- 苏节生平事略.....苏菲亚 (98)
- 太虚~~法~~师在闽南.....林纯仁 (108)
- 殷碧霞女士事略.....沈 芦 (120)
- 爱国志士张振才之死.....许国仁 (122)
- 热心文教事业的郑忠益.....李曼青 (128)

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

——陈国庆先生回忆录——

刘惠生 等合译
陈经华

译者按：《回忆我的父亲——陈嘉庚》一书，是由陈嘉庚先生的五子陈国庆口述，林贺申采访记录，时间为1982年12月，地点在新加坡怡和轩路9号。原英文本分四卷九章761页，约40万字。书中详细叙述了这位伟大爱国者、教育家、实业家和慈善家的一生。最后一章是写个人生活的，没有人做过描述，特将该章编译如下：

(一)

在这本我父亲传记的最后一章，我将尽可能形象、生动地介绍他（指陈嘉庚——译注）的个人生活。我父亲的一生，热爱祖国，倡办教育，矢志扶贫救困，热心公益事业，经营庞大的实业王国，因此，他无暇顾及妻子儿女。我现在能记得的是1920年以后，即我9岁以后的事：

我父亲对子女非常严厉，他和子女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中国的旧历除夕，全家团聚会，是他和孩子在一起绝无仅有的机会，即使是过年，彼此相见不过一小时，相互问安、拜年，别无他话。1920年，我随双亲第二次回国。我在厦门四年，住在浮屿，父亲住在集美老家，他一星期来看我们一次，和我们住上几天。一天，我在院子里看一群小孩和一个小贩玩轮赌，赢的可得一包糖果，我不知道父亲就站在

我的背后，手执手杖。幸好，我没赌。直至今日，我从未赌过，我对赌博毫无兴趣。后来我告诉母亲，要是那天父亲逮住我赌博，会毫不留情用手杖痛打我一顿。父亲最疼爱的兄弟是敬贤（共存的父亲），在兴建集美校舍、经营实业上叔叔都曾鼎力协助，但在年幼淘气曾被父亲责打。

父亲执纪甚严。早晨六时就敲我的房门，催我起床。我15岁那年，还在道南学校读书时，母亲给我买了一条领带，却给我带来许多痛苦。父亲看到我系领带，一再问我领带是从哪里来的？他说：“你还不会挣钱，却系起领带，要是你会挣钱，又要穿什么，戴什么呢？”直到三十年代，我长大成人，开业经营，才允许我系领带。

我就读的圣·约瑟学校打算再建一排厕所，校方要学生向家长募捐，我告诉父亲学校的计划，他二话没说，就给了200元，我交给董事长，他高兴得很，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哩！

1931年，我在新加坡读完中学，想出国深造，谋个军职。然而，父亲对我前程的想法却与我截然相反，执意不让我赴美。事实上，他要栽培我当整个三宝哇路橡胶厂^①的总经理。于是我就学习经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自谋生计，每月薪水微乎其微，只有15元，相当于该厂一个普通工的工资。定薪时，他把我叫去对我说：“这钱是少，但没关系，你是给咱自家公司做事。”在我要上班的前夕，父亲又给我带来一条大伤体面的消息。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的司机不送我上班，我必须从加东公园附近麦雅路的住家，走半英里路到丹戎加东路去赶公共汽车上班，整整六个月，我得天天赶，不得有误。那时我坐在来往于实乞纳到市中心的六座

①即陈嘉庚公司橡胶制造厂，占地10英亩，曾拥有男女工人6000名。

的“蚊子”车上，受尽工友的嘲笑；他们有时故意嘲弄我、挖苦地叫我“头家子”。父亲这样做，其背后的目的似乎叫我吃苦。东南亚国家的华裔移民为锤炼其子弟，在他们刚跨上生活道路时，通常都沿用这样传统作法。他经常对我说，他不想把财产留给任何一个子孙，理由是“财富使智者丧志，愚者更愚”。他去世时，没有留给子孙一分钱，他把全部财产献给教育和公益事业。我们兄弟都得自己谋生，有的运气较好，较有成就，有的较艰难。谢天谢地，我算是较幸运的一个，一家过着较舒适的生活，所有子女都受过大学教育。

（二）

父亲生活淡泊节俭，只有极少的生活用品。他厌恶骄奢和排场，除了每周末长途跋涉去巡视橡胶园，有时去察看马来亚等地的橡胶厂外，他一生身边带的钱从未超过5元。他一生没有做过生日，也不许家里的人在他的生日去看望他。有时身体不适，也不喜欢任何人问他身体如何，他不喜欢别人提醒他身体欠安。父亲只进饭菜，滴酒不沾。年轻时，试着抽鸦片、香烟，但二十年代就戒掉了。他从不赌博。有个朋友林崔干，此人当怡和轩俱乐部主席多年，直到去世，他对我父亲这样一个俱乐部成员赞不绝口，他说我父亲是一个从来没有在俱乐部提到“赌博”、“嫖妓”这类字眼的先生，父亲和亲友谈论的不是生意经就是公益事业，没有沾过象林说的那两桩丑事。事实上他强烈谴责以娼妓为业、聚赌为生。

父亲最不能容忍的是结婚铺张糜费、丧葬迷信挥霍、使人消沉意志的娱乐、暴殄天物祝寿等的排场。对那些只说不

干的人，不屑一顾。在政治生活中，他对腐化、滥施权力极其厌恶。他鄙视虚伪、自私，讨厌华人社会中的二流子和寄生虫。

我祖父和家里许多人信神信佛，但父亲不信教。他对我说过他不信教，但他坚信：“作恶之人难逃苍天惩罚。”

有时候，他回家吃晚饭，和我们吃一样简单的饭菜。他吃一碗米饭，一碗蕃薯稀饭，喜欢吃稀饭配一块红豆腐。早上五时起床。先做徒手操、再洗温水澡，六点早餐，三个半煮熟的蛋，一杯牛奶，没有咖啡也没有面包。他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林文庆博士告诉过他喝咖啡的种种弊端。在怡和轩俱乐部附近，有许多中国菜馆，他从不花一文钱在饭摊或饭馆吃饭。晚饭后，在花园散步一小时。父亲睡得很晚，很少在午夜前上床，也不睡午觉。

父亲生活极其简朴。一天，母亲向他要些钱买一套家具，更换客厅那套用过几十年的旧家具。他对母亲说：“你为什么不搬到维多利亚街家具店去住？”那时，维多利亚街尽是些价钱适中的家具店。

（三）

父亲天生就是一个敢担风险的人。勇敢机警，喜欢冒险去做那些心中无数的事，而且往往蛋未孵就先数鸡。他说：

“社会公益事业要视自己的能力随时随地去做，如果要等到发财才去做，终生将一事无成。”

1942年，日本飞机不断轰炸新加坡海军基地，他站在基地劝工人回去做工，帮助英国海军当局，面临日机的轰炸泰然自若。在场英国军官莫不钦佩之至。

1946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风云际会之期，他支持毛

泽东，打电报给哈里·杜鲁门，要求停止支援蒋介石，遭到新加坡、马来亚中、英文报纸猛烈攻击，但他毫不动摇。当新加坡面临日本进攻，危在旦夕之时，许多朋友劝他离境。因为谁都知道，日本人占领新加坡，第一个要抓要杀的就是他。他却直到局势完全无望才悄然离开。

1934年，由于世界范围经济不景气，加上英国债权人的阴谋，父亲的企业被迫收盘。对此，父亲却十分镇静。有一天，他对我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他说，要是事情没到这一地步，他永远没有机会休整。

有一次，我们到巴生橡胶种植园，经理告诉我们，前天一个男割胶工被老虎叼走了，后来在小溪边找到一半尸体。柔佛州的狩猎监督就要来搜捕这只猛兽。父亲执意要去看残尸现场，胶园经理告诉他猛兽还在出没，他坚持我们四人（父亲、我、经理及助理）步行到现场，但什么也未看到。父亲只带手杖，我们各带一把雨伞，如真碰上老虎，这些又有何用？想到我们毫无准备，不禁不寒而栗。后来我告诉母亲，她都给愁死了，每次我们去种植园，她在家里总是六神无主，我尽力劝导她说：这种事不会每次都发生的。

（四）

三十年代，我到怡和轩俱乐部帮助南洋华侨筹赈会工作，和父亲一起的机会更多了。父亲经常和我交谈，话题丰富多样。他常谈自己的故事，讲中国历史和时事，不用多说，在经常的接触中，我更了解他，喜欢他，崇拜他。我发现他心地十分善良，赋予灵感。抗战前那几年，我在思想上、政治上更接近他。他常同我谈一些秘闻轶事，使我更坚定支持他的事业。他有一种罕为常人所有的天赋，也是留给

我印象最深的品质，这便是他能随时代应变的能力，他能跟随时代的潮流，接受新思想。四十年代，他支持毛泽东完成中国统一大业，便是一个明证。

父亲办事勤勤恳恳，一生那么多年，无一日间断，没有休闲，也没有假日，一周工作七天。周日，白天在工厂、在办事处工作，晚饭后在怡和轩俱乐部处理社会公益和教育事务。周末巡视巴生及柔佛州其它地方的橡胶园，单程通常要三小时，路途遥远，艰苦乏味，待我们返家，夕阳西下。有一次照例出巡，发生车祸，父子俩人都差点送命，我们险些被抛到鳄鱼成群出没的柔佛河中。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们驱车从巴生回程，天下着小雨，道路湿漉漉的，我们的车速25英里，到柔佛干线5英里路碑处时，拐过河道弯道，车轮突然打滑，我们的马来司机卡森完全失去对方向盘的控制，汽车直向河里冲，眼看就要栽入河中，突然车的右轮撞到路边的电线干，这一撞，车子转过向来，最后撞到山脚下。车的散热器和车罩全毁，油箱严重受损，汽油四溢，流满路面。幸好，没有起火，要不然，我们会活活烧死。但是车子的冲击力把我们都摔到椅座下，我相信，我们都有几秒钟的昏迷，幸亏醒来无恙。

1932年，我有一次巡视三宝哇路橡胶厂时，站在一个巨大圆筒型的汽车轮胎硫化器边，看工人把硫化器的盖子打开，顶出硫化的轮子，父亲过来，对我交谈几分钟就走了。不久，办公室的勤务员要我去接电话，我刚走到路对面的办公室，突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厂房和场地震得直颤、厂里一片混乱，我冲进工厂，轮胎硫化器的旁边，直挺挺的躺着六个人，他们全被从硫化器溢出的滚烫水严重灼伤。我赶紧向医院求救，把伤员送进医院，急救处理。我每隔一天都到医院看望受伤的工人，他们受到精心的护理，但不幸有三位

死亡。后来查明，是工人未等硫化器的蒸汽排尽，违反操作规定，急急忙忙把半吨重的硫化器盖打开，结果，蒸汽把硫化盖顶抛到空中，差点冲破屋顶，幸好，盖子用一条粗铁链拴着。要不，后果不堪设想，要是我和父亲在场，说不定都死在那里。

父亲在三巴哇联合企业巡视时，解下领带，脱下西装，一直到中午十二点。他同雇员谈话，检查产品。到中午，主持开会，七个主管一项或几项生产部门的监督与会。工厂雇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技师。时常受到各国途经新加坡的大人物（Vips）光临。工厂生产各种胶制品，小至玩具、塞子、热水袋、橡皮擦、外科用品，大件如胶鞋、胶靴、橡皮管以及各种型号的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的内外轮胎。公司拥有80处销售分行、分布在世界各国42个城镇，还设有代销商。会上各部门监督汇报生产进展，提出生产问题。父亲帮着作出决策，因为父亲在决策方面总是敏锐果断，会议很少超过45分钟。午饭后，驱车前往里峇峇利路一号总办事处，处理各种事务。总办事处有雇员100名左右。我的两个哥哥济民和厥祥、姐夫李光前都曾任过职。直到下午五点又到怡和轩俱乐部。

记爱国侨领庄希泉

叶赛梅

1988年5月14日，著名的爱国侨领庄希泉在走过百年的人生道路之后，与世长辞了。这位以“永爱中华，此志不渝”作为毕生信念的老人，一生栉风沐雨，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新中国的侨务工作，作出许多宝贵的贡献。他那整整一个世纪不寻常的经历，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称颂的往事，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迪。

庄希泉祖籍福建安溪，其父迁居台湾经商。1888年9月9日，他出生于厦门。少年时代，曾就读于厦门同文书院和勤清举人办的学馆。他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华民族蒙受屈辱之时，腐败的清政府相继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正如庄希泉所说的：“我是在屈辱中长大的，是腐败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见证人。”他的启蒙老师陈观波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人士，教学之余常给他讲述孙中山等人在海外从事革命的故事，还介绍他阅读章太炎、邹容等民主革命家的著作。由此，年青时代的庄希泉便萌发了爱国主义意识。1906年，年仅18岁的庄希泉随父到上海经商，由于他们的商行经常资助设在上海的泉漳会馆及其所办的泉漳中学，使他有会结识一批民主革命志士，当时被孙中山誉为“功在民国”的前清举人沈缙云就是他的挚友。祖国遭受的屈辱，导师的启蒙、朋友的熏陶，铸就了庄希泉的爱国主

义情操，使他逐步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1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光复，成立了临时军政府。为帮助上海军政府解决严重的财政困难，庄希泉受军政府的委托，组织“南洋募饷队”，于同年11月间赴南洋华侨革命中心新加坡，庄希泉第一次见到了爱国侨领陈嘉庚，并在陈嘉庚的帮助下，募集到十万元巨款，汇给上海和福建的革命组织，为推翻封建帝制作出了贡献。

1912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从事实业救国，在上海筹建中华实业银行，计划筹资一千万元，而其中的一半股份准备向南洋华侨招募。为支持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已回到厦门的庄希泉欣然领命前往新加坡、槟榔屿、缅甸等地募股，不出三个月就超额完成了海外招股任务。由于股份迅速凑齐，中华实业银行很快正式开业，成为民国建立后的第一家银行，孙中山任名誉董事长，沈绶云任总行行长，庄希泉任该行南洋分行副经理。

1914年，庄希泉因劳成疾，返回厦门治疗。孙中山为反对窃国大盗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蒙难海外，中华实业银行被迫关闭，庄希泉第三次南渡，处理南洋分行的善后工作。

1915年12月，袁世凯筹备称帝，辛亥革命彻底失败了，庄希泉追求的实业救国的愿望无法实现，但他的爱国之心没被泯灭，仍然在探索着救国的道路。

辛亥革命失败后，庄希泉被迫羁留海外。在新加坡，他结识了余佩皋女士。这时，欧洲战火连绵，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庄希泉决心在南洋兴实业、办教育，寻求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生存、进化、文明和强盛，与其教育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妇女受教育的机会极少。为此，他于1916年主持新加坡“中华国货公司”的同

时，又在新加坡三角埔兴办“南洋女子师范学校”，聘余佩皋任校长，自己任董事长。和其他校董、教师戮力同心献身华侨教育事业。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南洋，大大地激发海外游子的爱国热情。华侨掀起提倡国货、抵制和焚毁日货的热潮。南洋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还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声援国内学生的爱国行动。英国殖民当局将华侨的这股爱国潮流的兴起归罪于华侨教育，竟然不顾国际惯例，于1920年5月间，抛出了24条限制华侨华人办学的《海峡教育条例草案》。对此，庄希泉怒不可遏，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他说：“这种条例如果实行了，不但华侨要返回到从前的野蛮状态，就是英殖民政府也要耻笑我们中国人。我现在牺牲全盘生意，也要替中国人争回一点人格。”遂联合余佩皋、陈寿民、张国基等华侨教育界人士，成立“华侨学务维持处”，发动了一场震动马来半岛的“争人格、反苛例”的斗争，在抗议书上签名的达20多万人。庄希泉的言行，激励了华侨们的爱国精神，但也激怒了英殖民当局。1920年7月24日晚，庄希泉在家吃饭时，几名便衣侦探采用绑架手段，将他投进新加坡亚朗敏监狱。在狱中，庄希泉为争得华侨人格，维护民族利益，不惜倾尽钱财，延聘律师，向英国政府控告新加坡殖民总督，坚决与殖民当局斗争。在被关押三个月后，伦敦法庭最后终审判决：“总督拘留逾期违法，庄希泉予以释放”。这场斗争的胜利，长了华侨的志气，灭了殖民当局的威风。

出狱后，庄希泉与余佩皋结婚。这时的庄希泉虽然经济拮据，但他反抗殖民当局的锐气不减。正因为如此，殖民当局采取前门放人，后门抓人的卑鄙手法，就在庄希泉新婚的第二天，再次拘捕了他，并在10天之后，不容申辩地判处“永

远驱逐出境”。

1921年初，庄希泉被强行“送”上轮船，驱逐回国。在和同胞们依依惜别时，他满怀激情填了一阙《满江红·出境留别》，词的末后写道：“我十年相亲的同胞啊，望你勿从此灰心，望你勿从此便辍，待故国山河重改造，从头说。”这是对同胞的勉励，也是他爱国精神的真实写照。

回国后，庄希泉与夫人余佩皋于1922年在厦门创办“厦南女子学校”，并合著《南洋英属华侨教育之危机》一书，向国内外同胞报告华侨教育的危机和华侨抗争苛例的经过。1925年，国共两党合作期间，他加入国民党，任福建省国民党临时党部执行委员。这段期间，他一方面继续教育救国的未竟之志，一方面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浪潮之中。同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庄希泉联合厦门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组织“外交后援会”，领导厦门市民罢工、罢市、罢课，抵制日货，开展反日救国活动。庄希泉的爱国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厦门领事馆的注视。

厦门外交后援会是个临时性的群众反帝爱国团体，成员中有革命的，有同情革命的，甚至也有反对革命的人物混了进去。在一次讨论罢工、罢市、罢课的会议上，庄希泉与中华中学校长林仲馥发生激烈的争论。林仲馥十分恼怒，居然甘心充当走狗的角色，向日本人密报说：“庄希泉的父亲在台湾经商，归籍台湾，其儿子自然也是台湾籍民。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人反对日本就是犯法。”厦门的日本领事本就有意抓庄希泉了，既然有林仲馥告密，更有拘捕的借口。1925年7月4日，当日本驻厦门领事要将庄希泉押往台湾监禁时，厦门好几千人涌向码头，抗议日本领事馆的无理行径。面对群情激奋的父老乡亲，庄希泉立在甲板上高呼：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反帝斗争要彻底干下去。”体现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大义凛然的斗争精神。

在台湾，庄希泉被监禁9个多月，受尽非人的虐待，于1926年4月间获释。但日本的台湾殖民当局，不准他再回中国大陆。而庄希泉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时刻都在跳动。1927年，他搭从台湾开往日本的轮船，趁轮船经上海靠岸之机，躲开日本警方人员的监视，登岸潜逃，随即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声明：庄希泉乃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并非日本侨民。同时宣称改名“庄一中”，表明自己坚定的意志。不久，他又从上海回到福建，与夫人余佩皋一道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庄希泉被迫从福建撤往上海，随后又辗转到达菲律宾。同年，他毅然脱离背叛孙中山的国民党。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东北。目睹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庄希泉忧心如焚，义愤填膺。在菲律宾，他和侨界知名人士王雨亭合办《前驱日报》，猛烈抨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主义，号召海内外人士同仇敌忾，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为此，他又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1934年夏天，当他返回厦门探亲时，竟被国民党当局扣押，后经各方营救才幸免于难。就在这一年，他的夫人余佩皋不幸在上海病逝。历尽万种磨难，又痛失贤内助，庄希泉的身心受到极大打击，但丝毫动摇不了他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出狱回菲律宾后，继续主持《前驱日报》，宣传抗日反蒋。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住在菲律宾马尼拉的庄希泉，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为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38年到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福建救亡同志会，救济难民，创办“建光学校”和“立华女子中学”，继续兴办教

育事业，并积极协助台湾革命同盟出版《战时日本》杂志。直到香港沦陷前不久，他才迁往广西桂林。1942年到1945年，他分别在柳州、重庆组织闽台协会、闽台建设协进会。1942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最困难时期。这一年，中共广西党组织遭到敌人破坏，为解决经费问题，党组织找到庄希泉，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这时的庄希泉，尽管家产所剩无几，但仍毫不犹豫地决定变卖在香港的全部资产，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疾风知劲草”，在共产党的处境艰难的时刻，庄希泉郑重地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决心加入中国先驱者的行列，更好地为党工作。他曾说：“党在困难时期，需要我们的支持，这个时候入党才更有意义”。当时他的愿望是那么强烈，可是由于内战全面爆发，庄希泉与党失去联系，致使这一愿望无法实现。同年，他返回香港、新加坡经营进步电影和进出口贸易。1947年在香港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积极为党的海外统战工作、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尽心竭力。

1949年，新中国即将诞生，庄希泉受中共南方局的委托，从香港赴新加坡面邀陈嘉庚回国参加中国人民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在新加坡，两位爱国侨领欢聚一堂，乡情加友谊，谈得非常融洽，庄希泉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交付的任务，邀请陈嘉庚回国。庄希泉因故暂留新加坡。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庄希泉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消息传到南洋，华侨们欣喜万分，当时的《南侨日报》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并请他将一面左上角绣着五星、右下角缀着绿色椰树，上绣“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九个大字的红旗带到北京。

1950年初春，年逾花甲的庄希泉结束了侨居生活，告别

南洋，回到北京。在中南海勤政殿，庄希泉代表南洋华侨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献上那面凝聚着南洋华侨对新中国无限深情的红旗。从此，他也把自己的一片爱国之心，全部献给了新中国的侨务工作。

1950年，庄希泉与许琼华女士结婚。

1951年，庄希泉出任中侨委副主任委员兼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等职，1956年，任第一届全国侨联副主席。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有近百万华侨回国，他们有的抛弃优厚的待遇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有的回国升学，有的是侨居地难以安身而回祖国的，为了把党的温暖送到归侨的心田，庄希泉与陈嘉庚、何香凝、廖承志等侨界领导人一道，协助党中央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侨务政策，并深入各地侨乡，了解情况，亲自接待来访侨胞，组团出访，安置归国华侨，组织侨乡生产，为维护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以及加强侨胞团结和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为了更好地团结归侨、侨眷和侨胞，庄希泉曾多次提出建立全国侨联的建议，1956年，全国侨联在北京成立，陈嘉庚出任主席，庄希泉被选为副主席。

作为一个海内外享有盛名的侨界领袖，庄希泉为开创新中国的侨务工作，殚精竭虑，辛勤操劳，热心为归侨、侨眷、侨胞排忧解难，人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庄老”。

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开始，中侨委不少归侨被错划为右派，庄老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为这些同志辩护，从而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一年，他夫人许琼华在北京去世。

1961年陈嘉庚逝世，庄老任全国侨联代主席，负责全国侨联工作，并担任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文革”期间，庄老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和迫害归侨、侨眷的罪行极为愤慨。虽然他当时的处境也很